

新作点评



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全剧在南明弘光朝廷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大背景下,讲述复社文人侯方域(字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情缘离合,勾勒出明末清初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和复杂多变的世态万象。自问世以来,《桃花扇》被改编成各类剧目,尤以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改编最为人所共知。在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之际,导演陈刚将话剧《桃花扇》再度搬上舞台,在向前辈大师致敬的同时,也以其大胆的创新赋予了作品新的艺术风貌。

在《桃花扇小识》里,孔尚任说道:“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

肯辱于权奸者也。”这段话阐明了作者通过《桃花扇》诉诸民族大义的根本意图:明王朝消亡了,这段历史逝去了,那些作威作福、残害忠良的权奸也随波逐流,消逝于历史的烽烟中,唯有扇面上的桃花血迹历历在目,这血迹蕴含着李香君反抗权奸、矢志守节的精神。1937年,欧阳予倩创作京剧版《桃花扇》(后又改编成话剧剧本),也是为了唤醒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抵抗日本侵略者;同时,针对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而进行辛辣的讽刺和鞭挞。可以说,欧阳予倩的改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故而凸显了剧中的民族大义这个基本点。尽管如今的情势不同于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的时代,但新编话剧《桃花扇》却没有改变

在继承传统中创新与创造

——话剧《桃花扇》观后 □饶翔

这个基本主题,在某些细节处理上,还强化了这一主题思想。试举两例:

在欧阳予倩的话剧剧本中,李香君出场时通过郑爱娘的话介绍李香君在楼上读《精忠传》:“看到风波亭岳爷爷归天,就哭了起来。”新编《桃花扇》则把这句话说成说评书的方式,演员们在舞台上直观地演绎风波亭上岳飞父子慷慨赴义的英雄形象,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在增强戏剧舞台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香君出场时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她爱憎分明的性格,她对忠臣、英雄的爱和对奸臣的恨。

又如李香君雪天面斥权奸一场,新编话剧在原作基础上增加了一段李香君在雪地受罚时的内心独白:

八岁那年,爹妈被魏党所害,死在大狱,我一个人躺在街边快要饿死的那个晚上,月亮也这么圆这么亮。人间好苦,真想躺在雪里不起来了,就这么躺着,等到严寒过去,等到春暖花开,变成一缕风,变成一只甲虫,变成一棵桃花树都好啊。不,不,我不能这么没出息,我怎么想到死?侯公子去扬州抗清,我说过我要等他回来。我可是等了十年,才等来了心中的英雄……

这段诗意盎然的独白配以舞台布景和灯光可谓情景交融,主人公的思绪在现实与过往之间穿梭,以回忆的方式补充交代李香君的身世遭遇,于是李香君何以对魏忠贤等奸臣恨之入骨,在人物所坚守的道德立场之外,又更有了现

实的渊源和依据,并进一步丰满了人物的形象。

杨文聪(字龙友)的人物塑造也呈现了作品的主题。原作中,杨文聪是在混乱时势中左右逢源、和稀泥的角色,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新编《桃花扇》基本保持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和功能,又补充了对人物最终命运的交代:“杨龙友杨公受命于国破之际,驻守苏州。清兵随后攻陷南京,南明文武大臣除逃亡外,大部投降。清将曾派人往苏州劝降龙友,说客却被文聪所杀。杨公孤军奋战,做困兽之斗,屡挫清军。终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劝降不从,与其子鼎卿同斩,以死殉国。”慷慨之言震撼人心;继而在舞台上虚拟出先后以死殉国的两位将士惺惺相惜,携手离去的场景,进一步烘托和升华了作品坚守民族大义的主题。只不过对杨文聪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剧作似乎还可再铺垫细节以增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逻辑性。

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宣明民族大义的同时,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由于时势所需,欧阳予倩在改编时强化了民族大义主题,而淡化了历史兴亡感,新编《桃花扇》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恢复,这主要体现在对侯朝宗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侯朝宗一介风流名士,在扬州跟随史可法守城时直面真实的战争杀戮和无数人的生死时,内心产生了恐惧和动摇,逃回南京寻找李香君的途中又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编《桃花扇》在结尾处补充了一段侯朝宗面对李香君

质问时的回答:“香君,我从小遍读忠义诗书,一心要报效国家。可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臣又在哪里?你知道的,我也曾书生意气,想力挽狂澜!可是经历了这一切,我才明白,乱世之中,一己之力如同蝼蚁。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江山风云还谈它作什么!茫茫末世,我只想找到你,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管他什么家国社稷,这些都不重要,短短余生,只要有你我相伴相依就够了!”侯朝宗在民族大义上有亏,但在乱世中苟且安身,与香君在离乱中重逢厮守的愿望还是有其人性合理性的,新编剧本将对人性的理解放到乱世中,凸显了个人选择的

不易,使得整部剧的美学基调深沉悲凉,以离合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此外,新编《桃花扇》在艺术形式上也屡有创新,如苏昆生既充当了剧中的角色——戏班的师傅,又充当了击鼓说戏的“叙事人”。将苏昆生与大鼓置于舞台前景,鼓点在关键处响起,声声摄人心魄。他在剧中自由地“进进出出”,产生了布莱希特戏剧式的“间离”效果。剧中还安排了数位“创作者”角色,起到了类似西方戏剧中的“歌队”作用,发挥着介绍情节、评述人物的功能,这些都是新编《桃花扇》将现代戏剧元素融入传统戏剧的大胆尝试。同时,在舞美设计上,在全剧基本的风格上,剧作又强化了民族美学元素,使新编剧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在继承传统中的创新与创造。

艺谭

词作家龚爱书的创作之路

□张志军

近日,中宣部组织遴选并公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中,由河北邯郸词作家龚爱书创作的《党啊,亲爱的妈妈》位列其中。这首歌是龚爱书歌曲艺术创作的最好代表作,于1981年他在邯郸市歌曲创作学习班学习期间创作,当时的名字叫《妈妈,你的恩情怎样报答》,是《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原始版。

这首歌曲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既叙述了妈妈为养育儿女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又表达出儿女发自内心的“报答恩情”的强烈愿望。歌词充满深情,拨人心弦。

1935年7月龚爱书出生于河北省磁县南左良村,2岁时其母亡故。幼年、童年、少年……终其一生龚爱书都渴望得到母爱。青年时期的他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成长起来的,在歌声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并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建设中。在矿上当工人期间,他和工友们常在一起念着顺口溜:“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后来他当过记者、法院的书记员,又到了郊区宣传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创作歌曲。1981年,龚爱书终于如愿以偿调入市群艺馆,专事歌曲创作。工作和生活中的“节节高”,逐渐使他加深了对“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歌词的理解。1960年,25岁的龚爱书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并于6年后如愿入党。

言为心声,歌为心声。龚爱书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创作的。在其子龚炎丰的回忆里,父亲回到家仍手捧写着歌词的稿纸,爱不释手,时而低声吟咏,时而笔触纸间,一字一句斟酌。百余字的一篇歌词调动了龚爱书几十年的情感。他要把母亲对儿女的慈爱、党对人民的恩情全部写进去;要把儿女对母亲的报答、人民对党的回报全部表达出来。歌词成了他情感蓄积的勃发和强烈宣泄。

后来,为了这首歌能在长沙纪念建党60周年联欢会上演唱,词作者余致迪经龚爱书同意,对歌词进行了部分修改,歌曲名也随之改为《党啊,亲爱的妈妈》。

1984年央视春晚上,殷秀梅的一曲高歌让《党啊,亲爱的妈妈》唱响大江南北,成为了全国人民喜爱的优秀歌曲。后来,殷秀梅在邯郸演出期间见到龚爱书,她握着龚爱书的手说:“衷心感谢您为邯郸、为全国人民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不久后,她又又在《人民音乐》上发表文章说:“这支歌歌词韵律上口,明白如话,调动每个人的切身感受,在简洁朴素的叙述中,融入对母亲、对党的深厚感情……使人听之如饮甘醇,意味不绝,遐思深远。”

《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不仅打动了亿万中国人,而且也传唱到了国外。1994年盛夏,龚爱书和漫画家徐华峰随邯郸专家考察团到朝鲜,并著文记录了她的感想:“8月1日下午我到平壤六月九日高级中学(因1969年6月9日金日成主席批示在此建校而得名),由15岁的女同学白顺金用华语和朝鲜语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此时,我心中非常激动,想不到能在朝鲜听到我们的歌。……歌声将要结束时,我即站起来与同行的同志一起鼓掌致敬。这时,译员非常激动地告诉大家,词作者龚爱书就在现场,台上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走上台紧紧握着白顺金同学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还得知,《党啊,亲爱的妈妈》在1990年就用朝鲜语录制出版了盒带向全国发行,并迅速在各地传唱起来。”

懂得感恩,方得始终。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先后在全国评选中9次获大奖,广播电台、电视台竞相播放,百余种书刊杂志予以介绍。龚爱书因创作歌词而名气大涨,但他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在创作之余,也把更多时间用以培养歌词创作后人。

2000年初夏,因患癌症龚爱书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他用尽力气又创作了一首新歌《爱,来自党的胸怀》以庆祝即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每一次点燃生日的蜡烛,心中就亮丽一片爱。爱的激情滚滚涌动,爱的赞歌声声豪迈……”词作完后他即交给儿子庆丰发给《词刊》编辑部,很快编辑部就复函相告准备刊用。得知消息后,龚爱书好似了却了一桩心事,只盼早日见到作品发表。谁料,6月8日他却永远告别了心爱的事业和亲人。《词刊》编辑部于这一年第4期刊登了龚爱书这首词并配发了“编者注”:“龚爱书同志为中国音乐文学事业献出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其代表作品《党啊,亲爱的妈妈》唱响全国,久久流传。龚爱书同志对党无比热爱,忠贞不渝……”

评点

近年来,国剧以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作为突破口而收获口碑、收视的优良之作逐步增多。如何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好传统文化之美,颇值思索。

近期优酷网络平台播出的剧集《长安十二时辰》自上线以来在关注度和口碑等方面成绩亮眼。这部拍摄历时200余天的剧集一经播出,便在豆瓣收获了8.8的高分。其扎实的剧作叙事、颇具匠心的摄影调度、严苛推敲的背景细节等被无数观剧者点赞。剧中缩影呈现的千年长安风貌,不仅成为了全剧亮点,也令整部作品洋溢出颇具雕琢感的人文气息。在精益求精的视听制作氛围下,《长安十二时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创作语汇之中。

除却饱满的人物设计和剧作内容,《长安十二时辰》所表现的深刻文化内涵亦显厚重。该剧的场景搭建共花费7个多月,营造的美术氛围无比惊艳,服化道的水准亦远高于预期,不仅可从视觉上烘托剧情,更在赏心悦目之余,令不少观众大呼“学到了!”例如,剧中以人物身份性格为基准,以服装作为诠释历史面貌的重要载体,设计了样式各异又符合历史记载的人物装束:军人着颇为讲究的“缺胯袍”,官员着官阶不同的花纹圆袍,兵士着实战用的龟甲背,神像着祈福驱疫的百衲衣……甚至连服饰的细节、穿法也拒绝含糊。观众通过切实严谨又华彩纷呈的服饰,不仅能学到传统服装的样式规矩,也能领略颇具特色的传统服饰之美。

在妆容方面,剧中的细节考据亦值得称道。据了解,剧中几乎每位重要角色在上戏前都需化妆近3个小时。剧中时代的粉底并非肆意涂抹,而是要用肤白打上三四层,再以胭脂从局部修饰,并注意同粉底的过渡;而眉形设计则依据了史载“十眉图”的讲究,不仅要符合时代特征,也要贴合演员脸型;发型设计也并非随意扎起,一盘而就,剧中男性角色均戴幞头穿靴子,并在各种发型中寻找搭配。这种细致入微的服化语汇,在光影的互动中激活了充沛的美学基因,形成了更具视听化的表达力量。

《长安十二时辰》大受欢迎背后是影视创作与传统文化讲述的双向关系:传统文化魅力并非是影视创作取巧的附庸,相反,二者不仅相辅相成,并且互相影响。以影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视听中焕发的传统文化之美

□何天平



听的创作手段为媒介,传统文化之美的展现更被大众喜闻乐见。而另一方面,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则需要优良的匠心与严谨的姿态,使之在视听语言中得到自然而然的诠释,使影视作品得以在先人智慧的灵韵中观照当代。

《长安十二时辰》一剧中洋溢的唐风古韵不止在国内市场得到了肯定,在海外观众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剧作靠细节发散的艺术感染力使观众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文化审美和观剧娱乐的双重需求,不仅向国内观众传递了厚重的历史记忆,也向海外播撒了独特视角下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传统文化题材剧集向外传播的步伐已加快,早先《甄嬛传》《芈月传》远销海外,曾引领了浓郁的中国风尚、中国潮流;《媳妇的美好时代》《鸡毛飞上天》《小别离》等现实题材国剧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热播,一轮成为“网红”剧集;《琅琊榜》《扶摇》等国产古装剧在海外轮番播出甚至引发外媒热议。海外观众在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文化“走出去”自然也水到渠成。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更为整体创作找到了传统文化上的精神坐标。

以视听手段切中传统文化的截面,不仅要扣准传统形式的艺术美感,更要把握住传统文化内里的核心思索令传统文化之美译出特有的深度。同时更需“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运用现代化的视听手段,使中国影视剧集的产出更有生命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书写在多种艺术渠道中有机关发。

在这样的期盼下,《长安十二时辰》的出现或许提供了一个优良范本,“成功”并非只是数据的堆积、“人气”的竞技。只有当创作者真正捕捉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以行业匠心尊重与雕琢,其作品中的虚构世界才会真正散发出观照现实的智慧弧光。因此,全方位提高制作水准,切实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中华文化向外走出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前提下,国产剧集的海外远航或将收获更具现代活力的新鲜温度。

专家研讨雷锋题材剧本创作:要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

以“新时代雷锋电影剧本的时代性与传承性”“中国故事与国际化语言的适应性”等话题为主要议题,近日,由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求是影视中心主办,以编剧黄亚洲的小说《雷锋》为蓝本构想的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在京举办。文学界、影视界等专家20余人参加研讨。与会者从雷锋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代内涵,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以及重拍雷锋题材的难点、突破点等入手,就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在新时代更好地挖掘并传承雷锋精神发表了各自看法。

专家指出,雷锋精神诞生于物质匮乏、国家贫弱的特殊历史时期,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曾深刻影响了几代国人。雷锋不仅是时代楷模,其精神价值更是永恒的,其精神中所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对解决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精神领域、道德层面所遇的种种困惑亦具有积极意义。专家谈到,2020年是雷锋诞辰80周年,在今天以电影的形式再次挖掘并传扬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对于引领当代青年人重新发现、感受并继续继承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来说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雷锋精神内涵丰富,重拍雷锋题材不能囿于题材本身,关键要能切入时代痛点,做好艺术转换。只有深刻打开人物的心灵世界,打通时代与人、时代精神与时代间的内在关系,才能真正以强大艺术感染力引发当代观众的认同与共鸣。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独特视角展现共产党人初心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峨眉电影集团等联合摄制出品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讲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怀着强烈使命感和冲破国民党封锁,冒险深入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真实故事。在日前由《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观摩研讨会上,十余位业内专家围绕该片的思想立意、艺术特色以及创作得失展开了深入探讨。

谈及创作初衷,影片导演王冀邢表示,我们不是在编一个故事,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让今天的年轻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成长历程,理解当年的革命先烈如何为了人民与信仰不断奋斗,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会专家认为,

该片对斯诺的陕北之行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精神内涵有新的探索与发现,既呈现了一个主动对世界开放的、为了人民的新生政权,又以斯诺的陕北之行,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影片的叙事视角独特,透过斯诺的视角来观察、审视中国西部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与工农红军等,营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影片的主要形象、历史细节还原度高,主要演员都较好地传达了历史人物在那个时代下的状态与气质,给观众较强的代入感。与会专家也谈到了影片存在的不足,认为影片缺少较强的戏剧冲突与故事高潮,对斯诺个人心路历程的转变表现不够,个别人物塑造上还存在概念化痕迹等。

(路斐斐)

7月20日至28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年度重点原创话剧、2019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剧目《人间烟火》将在京首演。该剧由娄涛鸣导演,林蔚然编剧,讲述了党员苏小鱼主动请缨主持基层社区棚户区拆迁改造工作,以真挚情感和智慧才干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故事。主创团队深入社会一线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以温暖的轻喜剧形式展现了生活在身边“城中村”居民的真实生活及他们与家园、时代之间丰富激烈而又深沉美好的情感关联。

该剧将真实的人物故事、细节融进创作,剧中穿插了亲情沟通、老人赡养、年轻人创业等社会热点问题,在对市井百态的呈现中,讲述了一个接地气、暖人心的小人国故事。林蔚然表示,剧中人拆掉的不仅是房子更是人心中的隔膜和壁垒,而重建的除了家园,信任还有人之间的情感接纳。娄涛鸣谈到,在二度创作上,团队主要从几个问题入手对作品进行了思考,即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赞美生活。据悉,该剧在舞台设计上采取了以圆形转台展示不同家庭空间切面的布景结构,随清晨、夜晚变幻的灯光效果将与之结合,共同为观众勾勒出一家家一幕幕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百姓故事。

(路斐斐)

话剧《人间烟火》讲述城市拆迁中的百姓人生